

晚清来华美国新教传教士 对科举制度的评说

孙邦华

内容提要 晚清时期来华美国新教传教士十分关注中国科举制度,并发表了不少介绍、评论科举制度的言论。本文围绕美国传教士对科举制度的积极作用、弊端及其改革建议等3个方面的问题进行论述,换一个视角,借西人的眼光,多方位认识科举制度的利弊。

关键词 新教传教士 科举制度 中西文化交流 美国

孙邦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100875

西方传教士作为16至20世纪沟通东西方文化的重要媒介,十分重视把中国的科举制度介绍到西方社会,并且对科举制度的特点、作用进行评说。自鸦片战争后后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对科举制度的态度与看法,是中西文化教育交流史、科举制度史、美国汉学研究史等领域不可忽视的研究课题。

美国新教传教士介绍、评述中国科举制度主要通过三种方式。首先,通过中英文报刊。譬如,来华的第一位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 C. Bridgman)早在1832年于广州创办的英文刊物《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除了经常报道中国各地科举考试的情况外,还不时发表介绍和评论中国教育和考试制度的文章。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狄考文(C. W. Mateer)等传教士通过《万国公报》发表有关中国文化教育的文章,不乏对中国科举考试的评论。其次,来华传教士回到美国

后,到各地做有关中国文化、教育、政治等方面的巡回演讲时,其中包括了对科举制度的评介,随后他们大多在此基础上把演讲内容汇编成书。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与丁韪良(W. A. P. Martin)的《翰林集》(Hanlin Papers of Essays on the Intellectual Life on the Chinese)与《中国人:他们的教育、哲学和文学》(The Chinese: Their Education, Philosophy, and Letters)等著作,即为其典型代表。再次,传教士在华传教期间通过对中国社会各方面进行长期观察与了解之后,撰写包括中国教育、科举制度在内的通论性著作。这类著作以明恩溥(A. H. Smith)的《中国乡村生活》(Village Life in China)、何天爵(C. Holcombe)的《真正的中国佬》(The Real Chinaman)等为代表。前述美国新教传教士都有在中国乡镇生活多年的经历,平常又十分注意对中国社会生活的观察与思考,因此,他们不仅对科

本文为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和北京师范大学青年教师课题:“介绍·赞赏·借鉴·批判——西人视野中的中国科举制度”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

举制度的介绍非常具体、生动,而且对科举制度的特点、作用的把握也比较准确、全面,评论较为深刻。本文主要以这些代表人物及其论著为视角,探析清末美国来华新教传教士对中国科举制度的认识与态度。

一、“开科取士,立意甚良”

美国传教士认为科举制度具有非常明显的优点,在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教育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首先,考试的公开、公平性,这基本上是自鸦片战争前后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和外交官员在评论中国科举制度时都承认的一个原则和优点。德国传教士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较早地指出了这一特点。他说:“该考试制度是从众多最有才华的年轻人中选拔政府官员,通向荣誉和财富的道路对所有人都是敞开的,这给了学子们以巨大的动力为此而奋斗。……这是从理论上讲所具有的公平的一面,这种理论在任何时候都必然获得绝对的认可。”^[1]

卫三畏再次肯定了科举制度的公开性、平等性原则,他说:“科举制度为所有人开辟了一条进入统治阶层的大道”,“科举制度把所有的一切置于平等的基础之上时,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人人平等的事从此出现。这个体系在初始阶段,确实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支持,因为它顺应了时代的要求;那些有望取胜的众多考生对废除科举制度的抵制与他们终身对事业不懈地追求,无疑又延长了科举的寿命。”“如果没有公开性、平等性原则,科举制度早就无法存在了”^[2]。美国传教士医师施惠廉(William Speer)也认为中国的科举制度就是“排开任何等级和财产而不论,选择最好的人去担任国家的各种职务,并作为从古至今无私地以才取士的总原则”^[3]。

丁韪良在对美国人发表公开演讲时,曾评论说中国科举考试“是完全温和与绝对公平的”,是民主的,因为它继承了中国“选贤与能”的传统,“考试是对能力与品德作最好测验的行为”,并且说“有什么能比像这样以提供全体‘公平机会’的鼓励‘更真正民主的呢?中国这种真正民主政治在世界各国中处于无与伦比的地位”^[4]。

在这些传教士看来,科举制度是不分贵贱、贫富、阶级、年龄,只问才学、道德,凡是通过定期的公开、公平的逐级考试,成为脱颖而出的佼佼者,就有可能担任各级政府的官员。当代学人也大都认为科举制度是比较公正、公平的选士制度,但是,事实上它并不像丁韪良所认为的那样

“绝对公平”。能够取得考试资格与是否能够考中,是要凭应试者的才学、道德。但是,也并不是只凭才学、道德,甚至“排开任何等级和财产”;通过考试而选中做官的也不能断定是最优秀的人。相对而言,何天爵的观点就与众不同(见下一目)。

其次,他们认为科举制度实行的逐级考试制度是一种具有很强激励作用的制度。以考试为基础的仕进制度实行奖勤罚懒,促使学子不断地参加考试,从而起到了激励人们学习、进而促使整个社会文化教育发展的作用。来华传教士通过对科举制度的观察,大都对考试的程式、逐级考试制度了解得非常清楚,并在他们的著述中做了详细介绍。他们非常惊奇地发现,科举考试分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等层级,而且预备级的童试又分为县试、府试、院试,通过童试的人,获取秀才的功名,也就成为府(州)、县学的生员。政府供给生员廪食,因而称之为“廪膳生员”。成为生员之后,未来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是继续参加乡试、会试及殿试,成为“举人”、“进士”,取得做官的资格;另一条路由府、州、县学“贡送”到中央官学国子监,学习期满并考试合格,也可授官。但是,随着科举制度的长期举办,生员人数也就越来越多,生员名额已不足应付,明清两代政府,于是又逐渐增设增广生员、附学生员,由此出现三类“生员”。“生员”是入仕之途的起点。明清政府为什么要设立府、州、县学及增设“生员”这一道关口?当代著名学者余英时认为这其中就包含了政府为了对科举制度两条入仕之途进行有效的控制,以保证“乡试”和“贡举”的品质不致下降这一目的^[5]。因为生员必须不断地参加考试:先是两年一度的“岁试”,继之又是“科试”,名列前二等的生员才可以晋升,末等者则被黜革。明恩溥在《中国乡村生活》一书中介绍了读书人经过竞争考试成为秀才之后,还必须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竞争考试从附生到廪膳生再到贡生的情况:“一个读书人取得了秀才学位,并不意味着他可以放松必要的学习。相反秀才学位叫做‘进学’,秀才们还得参加三年一次的考试,以竞争下一个更高荣誉的学位,即廪生秀才。……任何一个秀才都不能由于考虑到自己难以通过而不参加考试,相反,只要有考试,每位秀才都得参与竞争。……廪生也需要参加三年一次的考试,以竞争更高的学位,即贡生。”^[6]明恩溥把从附生到廪膳生再到贡生的升级过程理解为竞争更高一级的学位(功名),是一种明显的错误。卫三畏说“如果在接下来的考试发现有人荒废学业,这个秀才就可能丢

失已经得到的功名,因此,即使他不能再达到下一级学位(功名),他也不得不继续努力,以维护自己的影响^[17]。明恩溥认为促使中国文人不可遏制地追求学位的最主要原因是为了“追求名声和权力”^[18]。卫三畏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说:“最有能力的政府官员绝对是从最博学的学者中选出来的,跻身官场的荣耀和由此得到的权力对读书人具有巨大的刺激作用,同时也是他们多年苦读得到的回报。”^[19]

再次,科举制度是国家政治稳定的调节器、安全阀。科举制度是通过公开招考的方式从文人学士中选拔优秀治术人才,进入从地方到中央的官僚体系之中。从理论上讲,这个考试制度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任何人(除了明确规定的限制者外)都可以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通过考试而进入“士”的阶层。科举考试不仅使国家官僚系统由于不断有新的年轻有为的“士”补充进来而保持活力,而且使“士”阶层成为封建制度的坚定维护者,这是封建政府得以稳定、持续的一个重要原因。自明清以来的寓华西人都发现由于实行科举选官制度,在中国没有形成贵族阶层,或者贵族没有世袭制,与西方的任官恩荫制和贵族世袭制相比,是一种非常先进、完善的制度。

晚清来华美国新教传教士对此特点更有清楚的认识。卫三畏探讨了科举制度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由于这种制度造成了一个强大的文人阶层,授官的文人学士可以利用他们熟悉的治国之道统治民众;未授官的文人也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中层阶级”,“他们可以指导没有时间学习的劳动人民,也可以帮助政府管理地方事务”。还可以“制造公众舆论,控制公众言论”,“当人民的权力受到侵犯时,他们可以成功地反抗官方的决议;有时他们会联合统治阶级镇压叛乱或安抚民生。”因此,“科举考试对维护中国政权的稳定”所起的巨大作用“是其它任何因素都不可及的”;而且,他以太平天国革命为例证,清朝官员对政府的忠诚十分突出,没有一个官员自愿参加太平军,但因抗拒太平军而死的官员则有数百人^[19]。施惠廉说中国没有官僚世袭制,建立在竞争考试基础上的选官制度使“整个政府管理的政治原则公开化。为保证地方行政官员有知识、有能力和值得信赖,各种提拔的基础就根植在教育之上”;因此,他认为“中国稳定的大秘密”就蕴藏于这种制度之中,“整个世界无不为之赞美”^[11]。

丁韪良极力称赞科举制度对中国政治稳定起到了安全阀的作用。他说,这一制度对“政治的

影响”不仅深远而且有利,并且“比作家们曾经敢预想的更有利”,因为它“扩大人民的自由,贡献国家以力量;并供给抱大志的以职业,这易于保证公众的平静。社会的安全阀对那野心与活力者供给一道出口,否则这会突发内争与流血革命”^[12]。他把科举制度对政治稳定的意义从三个方面做了阐述:第一,“它通过对那些野心勃勃者安置一种职业,可免其可能在其他方面煽动扰乱或激动革命,从而对国家具有安全阀的作用”;第二,“由此发生的效力作为对专制帝王的权力可起到一种均衡作用。假如没有这制度,大职位将由世袭贵族所霸占,而小职位则因皇帝的恩宠由成千上万之人所寄养。由于这个制度,有才干者可由卑微的下官升至总督或宰相的高位”;第三,“它使‘政府笼络有学养的士绅,并约束他们对现存制度的支持’”^[13]。

林乐知认为科举考试“开科取士,立意甚良”^[14],丁韪良认为科举制度不仅是“中华帝国最佳制度”,而且主张美国仿效、采纳^[15],施惠廉对中国这种通过考试选拔官员而带来中国政治稳定的科举制度赞不绝口,认为美国共和制所缺少的正是这种选才取士的管理原则,呼吁美国仿效^[16]。与以上二人的看法有所不同的是,卫三畏一方面肯定了科举制的优点与作用之后,另一方面,又认为“对于一个文明的基督教国家来讲,这种制度是没有必要的”^[17]。

当代学者认为中国科举制度是一种学校教育与选官制度相结合考试制度,但又绝不是一个单纯的考试制度,而是把文化教育、经济、社会与政治结构紧密地联在了一起,形成一个多方面互动的大整体,余英时认为科举制度一直在当时的社会发挥着“无形的统合功能”^[18],从这种意义上说,晚清来华美国传教士基本上认清了中国科举制度所具有的特点与功能。

二、弊端丛生

众所周知,科举制度优点突出,缺点与弊端也十分明显。自唐宋至明清,历代政治家、思想家都在尝试着改革与完善科举考试的办法,补偏救弊,但是,一直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弊端。有的弊端是长期存在而无法很好地解决,有的弊端是后来新出现的,而且越到后来越突出。美国在华传教士观察到了中国科举制度具有多方面的弊端,并且对其进行了言辞猛烈的批评。

首先,他们普遍认为科举考试的内容陈旧、偏狭、单一。儒学经典一直是科举考试的核心内

容,明清更是以四书五经为法定内容,学校教育完全服从于考试制度。来华传教士认为由此造成中国青年学子拘泥于儒家学说,而除此以外的其它知识一无所闻,这正是科举制度的弊端所在。美国传教士何天爵对此说道,清代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的内容“都是从一些儒家经典中断章取义摘抄而来,而那些儒家经典作品都是写于早在基督诞生的几百年前”,“从古代到现在的一千多年以来,中国教育的实质内容并没有经历什么变化。当我们认真审视一下清朝所规定的教育内容,当我们又知道这些教育内容就是掌握和统治国家的高层官员们所必备的前提条件时,我们原先对那些充满智慧的道德说教和哲言睿语的钦佩与赞美,就立刻变成了深深的震惊和完全不迷信教条”^[19]。

传教士认为单一、偏狭、长期一成不变的教育和考试内容,加上以八股取士,这无论是对学子们的个体,还是对整个社会的发展,都造成了极为不好的影响。林乐知认为古往今来,社会已发生了很大变迁,但是,在科举制影响下,士人所读之书皆为2000多年前的古书,因而讽刺说,士人们的品行、学术、识见仍然还停留在2000多年前的水平^[20],中国文化教育、社会发展能不落后吗?他认为中国开科取士的本意虽好,但是由于存在着致命的弊端,因而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他说:“中国开科取士立意甚良,而惟以文章试帖为专长,其策论则空衍了事也,无殊拘士之手足而不能运动,锢士之心思而不能灵活,蔽士之耳目而无何所见闻矣。”^[21]狄考文也认为科举制度在考试内容上的弊端而错误地引导士人“拘定学经书”,连中国传统学术中的史书、诸子百家等都不闻不问,更不要说数学、化学、物理、天文等西方近代各种科学知识了^[22]。

其次,科举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国家选拔官员,传教士认为八股取士并不能选拔真才实学之人。狄考文批评说八股文章取士,仅得一偏之才,不仅不能选拔真才实学之人,而且也不可能代圣贤立言,实际起到了束缚士人思维的恶劣作用。他认为仅凭一篇文章定优劣,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况且作文只是学问的一个方面,而非学问的全部,“要宜知人之能文,乃学问之偏端,非学问之全体。夫能文者,不必尽为博学,即博学者,亦不必尽能文也”,“能文,特一偏之长也”^[23]。林乐知批评说:“若夫朝廷得人而官之,固欲其能经国家、利社稷、定民人者也,乃取士之制,只凭制义试律,土饭尘羹,既空疏而无用,即条对经史、时

务诸策,浮辞剿说,亦摭拾而无根”。翰林院的翰林应是学问最渊博的人,但是“馆中所课,诗赋而已,楷则而已”,因此,科举考试直接导致了“所举非所用,所用非所举”的尴尬局面^[24]。

科举制度使中国聪明之士把终身精力耗费在陈旧的儒学和空疏的八股文之中,大多数人又成为可怜的落第者。这些人既不能获取功名利禄,又无一技之长,落第者一家往往穷困潦倒,无以为生,林乐知对此感叹到:“胥天下智能才艺之士一一束缚于举业制义试律之中,而不知变计之为,可惜也!”他认为中国自19世纪80年代以降,四面遭遇到各个列强愈来愈严重的威胁之时,文人学士仅凭写文八股文章是有助于退敌的,“万一疆场有警,诂一篇诗赋数行文字,即能成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功”?科举制驱使天下文人学士继续学做无用的八股文章。他再此叹惜说:“专尚举业之不足以得奇才异能,而不知变计之为,可惜也!”^[25]

再次,他们批评科举制度是导致中国士大夫泥古不化、排斥西学的重要根源。清代科举考试题目首场出自“四书”,考生所做八股文被要求“代圣人立言”,而且必须遵循朱熹的注释,不能丝毫发挥自己的思想,导致士子们思想僵化、保守。林乐知批评说:“中国墨守成规不知善变,此弱与贫所由来也。不知泥古转以病今。”^[26]林乐知是在华传教士中较早把中国传统士大夫死守孔孟之道、食古不化的根源归结为科举制度的人,他说:“中国则以率由旧章为不违先王之道,而不知先王之道宜于古,未必宜于今,今之时势非先王之时势矣。中国士人何食古不化若斯哉!终年伏案功深,寻章摘句,以为束身于名教中也,而实为八股文章束缚其身耳,天下所望于士者安在?”^[27]狄考文批评道:“盖文章之作,非惟题目不外四书,且言不宗乎六经,则斥为稗典,意不遵乎朱子,则批以荒谬。”^[28]他认为科举制度造成中国士大夫“惟知学古训”、“惟知重古薄今”等守旧的心理定势是非常有害的,学问之道应该是永无止境,只有愈求愈多,愈求愈新^[29]。何天爵也说:“审阅试卷的标准主要看书写是否规范、文体是否八股、内容是否孔孟。任何丁点超出儒家学说的独立见解都被视为异端邪说,都会受到严厉的谴责。”^[30]

第四,科举制度使整个社会形成了“官本位”思想和侥幸奔竞之风,由此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何天爵在《真正的中国佬》中对此进行了详细描述:“在中国,读书求学的一切动机和最高期望,就是要步入仕途。当每一名孩子由懵懂无知

到渐谙人事而进入学堂时,他首先被灌输和想到的,便是读书做官,而所有父母在为孩子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时,他们念兹在兹的,也不过如此。”但是,中式的名额非常少,远远无法满足广大应试者的需要。于是,“他们在希望与失望、成功与痛苦之间苦苦挣扎,皓首穷经,孜孜以求。……一位参考者由于过度紧张和兴奋,最后由于心力交瘁而毙命在考场里,这位考生的年龄是88岁。”^[31]卫三畏也指出:“(这种考试)经常会使年老的考生因劳累过度而暴死在考场上,但仍有后继者怀着希望走进这个竞技场。”^[32]在考试竞争激烈、残酷的情况下,一些人无法凭自己的真本事通过考试,又想实现朝思暮想的读书做官梦,因而不惜铤而走险,采取夹带、请人代考、行贿、作弊等舞弊手段,一些有钱人则采取捐纳的方式买到秀才、举贡的功名。林乐知、狄考文、卫三畏等人对于考试中出现的这些问题非常关注,并在各自的论著中进行了描写。

最后,何天爵对科举制度所规定的有关出身的限制颇不以为然。他认为禁止包括各类罪犯、娼优、宦官、主持丧葬仪式者、理发匠、跑堂的伙计、仆人等人及其子孙四代在内的人参加考试,是一种不合理的歧视性政策,“非常荒唐和可笑,纯属无稽之谈”^[33]。他认为中国人不难做出解释实施这种政策的原因,即他们从事的是下贱性的职业。但是,他们西方人是无法理解的。他是在以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天赋平等的人权理论批判科举制度中的人身歧视政策。何天爵等人还认为科举考试把近一半人口的妇女排除在外也是它的一大弊端。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林乐知、狄考文、何天爵与丁韪良、明恩溥、卫三畏对科举制度观察的视角是明显不同的,前者尽管认为科举制度“立意甚良”,但主要还是侧重于关注与批评科举考试出现的弊端,后者尽管也看到了弊端,但是主要还是重在强调它的积极作用。如果我们把他们的观点综合起来看待,对科举制度特点与作用的认知就会比较全面、准确。

三、“学堂之目的犹科举之目的”

来华美国新教传教士无论是否对科举制度提出过批评意见,但是他们都不否认科举制度是存在着弊端的。他们既然看到了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也就不断提出有针对性的改革建议。科举制度自确立到发展、完善的过程中,历代政府一直在对其进行持续不断的改革,改革的步骤不可

谓不大。清末中国不断遭受越来越强烈的西学、西力冲击,面临“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科举制度的改革也必须是根本性的,否则,无法适应新的形势。在这种形势下,包括美国传教士在内的在华西人也不断发表政论文章,倡言改革,提出种种改革建议或方案。但是,当时封建制度已走向没落,积重难返,清政府对科举制度的改革反应迟钝。

新教传教士提出科举制度的改革意见是从响应洋务官员的奏议开始的。1874年12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奏折中再次提出改科举办法。他认为既然“科目即不能骤变,时文即不能骤废”,因而主张对科举考试“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把“西学”纳入科举考试。即用传统科举考试形式,达到选拔“明于洋务”的人才。并且在沿海普遍设立“洋学局”,推广和扩大由同文馆建立所开启的洋务西学教育。由通晓时务的洋务大员“主持其事”,延请“博学而精者”的西人担任教习,招收对洋务西学略有基础之人入局学习,对学有所成者给予任用,“与正途出身无异”。在此,李鸿章提出的关于科举制改革方案初步显现出一种双轨制的特点,一方面,把西学楔入科举考试的正途之中,为洋学设科,另一方面,学习各种西学,学有所成者,视为同“正途出身”,亦给予任用,以此在社会上广开兴西学、办洋务之风,从而为洋务事业选拔和培养出一技之长的可用之才^[34]。

李鸿章的改革主张不可避免地遭到了顽固派的攻击,无法对朝廷发挥积极影响。美国传教士林乐知迅即做出反应。他在自己主办的《万国公报》上发表《论西学设科》,盛赞李鸿章的倡议。林乐知认为中国开科取士的本意,一方面,是国家为了“收有用之才”,另一方面,应试者“以其为用于世”。然而,八股取士使“天下才智之士锢聪塞明”,中国积弱不振。他认为清政府立即设“西学”科取士,将是中国转弱为强之契机。并提出在各省设立“储才馆”,即除了学习中国传统诗文之外,西方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几乎都纳入储才馆的教学之中。他认为对科举制度只需稍加变通,增设“西学”科,科举考试和西学教育同时并举。“诚使风气一开,不数十年而成效可观”^[35]。丁韪良也利用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身份,在与朝廷官员接触的时候,再三向内阁各大臣力陈改革科举考试、增考科学的必要。他在《西学考略·自序》中也说:“中国倘能稍用西术于科场,增格致一门,于省会设格致书院,俾学者得门而入,则文

质彬彬,益见隆盛矣。^[36]在同一时期,狄考文也认为要消除考试制度在考试内容上的弊端和弥补中国学术文化的缺陷,当前首要办法就是把算学、格物、化学、天文等实学列为学堂的功课,然后在科举考试中,实行“实学”与“文章”(时文)并考的办法。这样,实学便可在中国得到迅速推广^[37]。

19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变法运动的不断高涨,寓华西教士的教育改革主张重点转向提出建立体系完整的从低级到高级的学校教育制度,并主张学校教育制度与科举制度并存。一方面,在逐级考试中增设包括各种西学在内的多种科目,分别给予功名,“如此,则先代之成法,与因时之新例,并行而不相悖,而且学非所用、用非所学之积习亦可以渐除矣”;另一方面,国家定出新的科举考试条例,专任科甲为官,即只有通过中西学科目考试而列为科甲者,才能出入仕途^[38]。很显然,李佳白的改革科举制度方案的特点,就是从林乐知等人的西学单独设科改为中西学并考,其实质则是想利用科举考试这一工具为新式(现代)学校教育制度及其新式人才争取合法地位,用科举旧制度之名行新式教育之实。

从林乐知、狄考文等人的中西学科而立到李佳白的中西学并考,基本上都是对科举制度进行改良,相对而言,丁立端的改革设想要大胆得多。1881年,他在《万国公报》发表《中国考试利弊论》,主张对考试作些变通。变通之法就是把原来考诗赋、词章之学改造成专考天文、地理、格物、化学、工程技能等科学技术内容。他认为只要实施这样的改革方案,才不至使有志之士“以有用之聪明作无用之词说”,而“咸得伸其抱负,展其经纶”。从此,中国“将见人才日盛,治化日隆”;科举制度也就变得有利无弊了^[39]。这实质上是借考试之名,行西学教育之实。

与晚清急剧变动的社会相比,清政府的科举考试一仍其旧,几十年没有根本改变。19世纪末,在华西人不再是仅仅各自提出改科举的建议,转而开始联合起来提出建立一套独立于科举制度的新的公共考试制度(public examination system)。1891年5月,在华新教士组成的中国教育会(基督教)下设考试委员会,由欧美新教传教士所组成,以制定公共考试计划为目标。1899年12月,中国教育会与广学会联合推出了一份全国考试方案,取名《推广实学条例》,内容包括考试西学的条例、中英文西学课程单、西学阅读书目等3个部分。条例规定每年8月20日左右为考试日期;考试地点设在各省会、各府城及通商大埠;考

试用中文和英文两种分别进行,由应考者任选一种;考试分为初学、中学、高等学三等,应考者必须从初等到高等逐级考起;不预先设定名额,只按考试分数决定合格与否;各地考试前五名可选送进入西学书院学习,并给予膏火,以示奖励。应考者历经初学、中学、高等学三级考试,合格者发给文凭,然后再入大书院继续深造,或到外国留学,培养出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40]。

耐人寻味的是,这套全国统一的公共考试方案是仿照英国的经验而制定的,即实行把学校考试和选官制度分离开来的考试办法。这是来华新教士在此前提出一系列改良科举制度方案,但科举制度没有根本改革的情况下,另起炉灶,转而试图把英国的考试制度搬到中国,建立一套既不同于旧式科举制度、又独立于现行科举制度的新的公共考试制度,他们希望能以此促进中国新式教育的发展。应当说,西教士把学校考试与选官制度相分离的改革思想是非常超前的。

清末在华西人关于改革科举制度的建议最初是受洋务派的影响而提出,自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改革方案不断涌现,新论叠出,最终与维新派关于改革科举考试和教育制度的思想相互促进、遥相呼应,而且对清末新政时期张之洞不断提出改革科举制度的主张不无启发。张之洞既与新教传教士时相往来,又经常阅读西人发表不少改革科举制度建议的杂志《万国公报》。

清末新政时期,政府在科举制度改革上措施不断,而且较前大胆得多。美国传教士对此非常关注,并及时发表评论。当八股文被宣布废除时,林乐知立即发表文章表示赞赏,但是,他认为仅仅废八股文是不够的,“一日不废科举,则中国一日无进步,即十年而后,亦与今日无异,此固可断言者矣”^[41]。他认为中国如果废科举,将会促进新式教育的发展。“方今中国鉴于制艺取士之腐败,而改试策论,怨于书院课士之空疏,而改设学堂,亦足为仿效西法之起点,中国之学术至此已有穷而思变之势矣。苟循是而进之,于新设学堂之中,不但讲求新学,且添入释放之新道,务使人心出黑暗而入光明,解束缚而得自由,则凡学堂中所造就之人才,皆可成为中国之新民。”^[42]实际也正是这样,八股文及整个科举制度一旦废除,中国各地便兴起举办新式教育的热潮,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由之而生。但是,清廷在废除科举制度之时,又规定新式大、中、小学堂的毕业生分别授予进士、举人、秀才等“出身”;设立学堂的目的不过是栽培“异日以备朝廷之任,使作国家之栋梁也”,

入学堂的人也是抱着功名思想,“吾若干年毕业,则受证书得出身,而锦绣前程随后吾矣。”从而维护了新式学堂与旧式名位思想之间的联系,对此,林乐知很不以为然。他说:“学堂之目的犹科举之目的,舍是则何必立学堂,舍是则何用入学堂哉!”^[143]他认为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是不彻底的。多年以后,蔡元培、陶行知、蒋梦麟等中国教育家一再批评中国上新式学堂的人仍然抱着做官的思想,新学堂成为了洋八股。林乐知在科举制度刚刚废除时即已发表这样的思想,不能不承认他当时的目光是非常敏锐的。

注释

- [1] Charles Gutzlaff, *China Opened*. London, 1838, p346.
- [2] [7] [9] [10] [17] [32] Samuel Wells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New York, 1904, p572, 563, p550, p561, p564-556 p562-563, p.562.
- [3] [11] [16] 杨学为总主编,王戎笙主编:《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第六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04页。
- [4] [12] [13] [15] W.A.P.Martin, *The Chinese: Their Education, Philosophy, and Letters*. New York, 1881, PP. 42-43, p77, pp.53-54, p40.
- [5] [18] 余英时:《试论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5年10月号(总第43期)。http://www.cuhk.edu.hk/ics/21c/index.html
- [6] [8] 明恩溥:《中国乡村生活》,午晴、唐军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124页,第127页。
- [14] [21] [27] 林乐知:《中西关系论略·再续第四论谋富之法》,《万国公报》第8年第358期,〔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影印本(下同),第1583-1585页。
- [19] [30] [31] [33] 何天爵:《真正的中国佬》,鞠方安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79页,第189页,第186页,第

185页。

[20] 林乐知:《险语对中中》,蔡尔康译,《万国公报》,复刊第84期,第15727-15728页。

[22] [23] [28] [37] 狄考文:《振兴学校论·考试》,《万国公报》,第14年第655期,第8379-8382页。

[24] [25] 林乐知:《中国专尚举业论》,《万国公报》第15年第704期,第9261-9262页。

[26] 林乐知:《中西关系论略·第四论中外交接其联络维持之法究竟如何办理》,《万国公报》,第8年第356期,第1528页。

[29] 狄考文:《振兴学校论·错误》,《万国公报》,第14年第654期,第8362-8364页。

[34]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

[35] 万国公报,第7年第325期,第689-690页。

[36] 丁韪良:《西学考略·自序》,光绪癸未年(1883)孟夏总理衙门印,同文馆聚珍版。

[38] 李佳白:《改政急便条议》,《万国公报》复刊第90期,第16144-16145页。

[39] 丁立端:《中国考试利弊论》,《万国公报》,第13年第643期,第8174-8175页。

[40] 《推广实学条例》,《万国公报》复刊第132期(1900年1月),第18997-19000页;Records of the Fourth Triennial Meeting of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21-24, 1902,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2, Appendix C.

[41] 林乐知著、范祎述:《译谭随笔·师范学堂与仕学馆之亟宜设立》,《万国公报》复刊第202期,第23792页。

[42] 林乐知:《论中国之学术》,《万国公报》复刊第192期,第23105页。

[43] 林乐知:《中国振兴女学之亟》,《万国公报》复刊第200期,第23654页。

〔责任编辑:肖波〕

Comments on Chines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by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Sun Banghua

Abstract: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paid much attention to Chines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delivering speech of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s. This paper expounds such three aspects as positive effects, malpractice and suggestions on reform of Chines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discussed by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so as to view the system from a different westerners' angle.

Keywords: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Chines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culture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America